

國際政治中的不確定性與錯誤知覺

◎ 丁松泉

傑維斯 (Robert Jervis) 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中國的政治和戰略傳統強調知彼知己，決策與戰略設計建立在對彼方的知的基礎上，這構成為中國政治和戰略思想的一大缺陷。因為在國際政治中充滿著不確定性。即使擁有現代高科技偵察手段，也無法百分之百地了解對方的全部真實意圖與行為。事實上，正是因為國際政治中充滿不確定性和未知性，導致了一系列國際政治中的錯誤知覺。傑維斯 (Robert Jervis) 在《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指出了人類常見的錯誤知覺及其原因，可以為我們的政治與戰略決策思維提供有益的補充。

在國際政治中，國家作為理性的行為體，精於理性的計算，但是，為甚麼在行為體雙方均不希望衝突的情景中，在原本可以合作的條件下，會發生衝突和爭鬥，會拒絕合作而走向戰爭？傑維斯從決策者的心理認知這一最微觀的層次入手，分析決策者心理活動對於一個國家的國際行為起到的作用，他透過錯誤知覺的形成過程尋找答案。他意識到，作為重要的決策者和政策執行人的個人作用不容忽視。對於同樣的客觀世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同時，每個決策者均有自己的認知局限 (cognitive limitation)，所以難免出現錯誤知覺。

傑維斯發現，心理學理論中討論的幾個導致錯誤知覺的重要機制在國際政治領域同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錯誤知覺的生成機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認知相符現象 (cognitive consistency)。傑維斯認為，區分理性與非理性兩種相符理論能夠更加清楚闡明心理學理論在決策領域的應用。相符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理解為一種強烈的認知取向，即人們趨於看見他們預期看見的事物，趨於將接收的信息歸入自己原有的認識中去。當認知結構處於平衡狀態的時候，我們會感到十分愜意，我們會很快地知覺事物、記憶事物；我們對新信息的解讀也是以維持和加強這種平衡的方式進行的。因此，當決策者接收到的信息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不一致時，他們就可能對新的信息或者視而不見，或者曲解誤斷，以使其能夠與自己原有的認識一致起來。在許多情況下，決策者趨於忽略或無視來自對手的善意信號和姿態。傑維斯指出，無視與自己認識不一致的信息和將這樣的信息納入原有的認知框架之中，會使不正確的意象得以延續，使不明智的政策得以繼續。例如，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 (Patrick Hurley) 制定其中國政策時，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共產黨是弱小的一方，所以只能接受蔣介石的建議。他缺乏對中共實力的準確估計，也沒有去捕捉可以導致準確結論的信息。

第二是誘發定勢 (evoked set) 的作用。傑維斯指出，人們總是根據自己的關注對象來解讀收到的信息，這種誘發定勢可能有足夠的強度，使一個人忽視那些與自己事物無關的信息，而事後才發現這些信息是值得認真注意的。如果信息發送者與信息接收者有著不同的背景，

就會出現錯誤知覺。信息發送者認為是最重要的內容，信息接收者可能認為無足輕重或是不可解讀。信息發送者認為是明確無誤的內容，信息接收者可能認為是極端模稜兩可。更可怕的是，接收者會斷定信息傳達了明確的信息，可是接收者的解讀與發送者的原意恰恰相反。由於人們對新信息作出判斷的時候，受到他們接收這一信息時正在處理和考慮問題的影響，所以，重新調整人們的關注焦點是很困難的事情。

第三種錯誤知覺來自於歷史。人們常利用過去的經驗來支持自己的偏見。傑維斯指出：「歷史類比可以使人從以往的事件中獲取洞察力，所以是理性思維的有用捷徑。但是，這樣的類比也可以遮蔽現時事件中一些不同於歷史事件的側面。」（頁225）對於二十世紀30年代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的綏靖政策，美國政治家從中汲取了不同的認知。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Johnson）認為：「在越南投降不會（帶來）和平，因為我們從慕尼黑的希特勒那裡得到的教訓是，成功只能使人們具有更強的侵略野心」，而事實上，越南的情況與納粹德國並不相同。由於對綏靖政策的過份通則化，因而抵制國際政治中必要的妥協，往往導致不必要的後果。

傑維斯在本書的第三部分詳細分析了最常見的錯誤知覺。首先是統一性知覺。由於人們的認知取向是「將不完整的視為完整，將不統一的視為統一，將不圓滿的視為圓滿」，所以，人們往往會「過高地判斷人的性格的統一性」。進而，人們還往往高估對方內在特徵的作用，低估對方所處的環境產生的影響，結果就會認為對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國際關係中，決策者一般來說會過高地估計對方掌握情況和權力的程度，認為對方可以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本國政府的各個部分。另一種常見的知覺錯誤是「過高估計自己作為影響者和影響對象的重要性」。當對方的行為與行為體的預期一致的時候，他就會高估自己的政策影響對方行為的程度。美國和英國都宣稱，是自己施加的壓力使日本停止了1932年在上海的敵對行動。誇大自我作用的一種典型表現，是認為自己瓦解了對方的邪惡意圖，而實際上對方根本沒有這樣的意圖。例如，美國和南越的官員都預計，在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訪華期間，越共軍隊會發動大規模進攻。後來，共產黨沒有發動進攻，他們又說，由於他們及時的轟炸才瓦解了共產黨人的進攻。同時，願望與恐懼也常常導致知覺錯誤。傑維斯指出，人們有一種強烈的認知取向，即容易看到他們預期發生的事情，更常見的一種說法是，人們看到的只是他們希望看到的事情，亦即人們總是沉迷於自己的願望思維。鄒讜認為，美國在過去五十年裡，對華政策的特徵是各種各樣「毫無根據的願望」，即是一個典型例子。恐懼也有其一定的影響，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指出，在戰爭期間，「人的膽怯使他們更容易說謊和採取不誠實的做法。每個人都更容易相信壞消息而不相信好消息，這是一個通則。這在國際政治領域也很常見。」最後一種常見的錯誤知覺，則由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造成。認知失調理論認為，人們試圖證明自己的行為是正確的，即人們需要使自己相信，他們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或應該使用的信息，他們沒有白白浪費資源，他們的行動是可圈可點、前後一致的。他們過多地肯定自己制定的政策取得的成就，而更加淡化該政策造成的損失。他們會找到更多的理由和藉口來支持自己的決定，如果這一切仍不能消除心理不平衡現象，人們就會更加努力為自己的行為尋找合理的理由。斯大林試圖使中國共產黨融入國民黨，結果這一政策完全失敗。但斯大林拒絕放棄自己的觀點，他仍然相信國民黨可以成為蘇聯政策的得力工具。因此，他堅持認為，中國共產黨對待國民黨自由派時，應該像過去對待蔣介石那樣，採取比較恭順的態度。

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指出了國際政治中錯誤知覺的形成機制及其表現形式，提醒人們自己對對方意圖的估計可能是錯誤的，需要更審慎。在微觀領域拓展與深耕，對於全面把握國際政

治特質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國際政治領域，微觀視角與宏觀視角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本書僅僅指出了問題，而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對於國際政治中的錯誤知覺，如果僅僅從心理和微觀角度分析，其結果仍將可能是令人悲觀的。因為國際政治中互動中的行為體並不完全敞開自己的計謀，信息的提供並不充分，並且始終充滿著不確定性，無法真正實現「知彼知己」。同時，決策者可能接受到一大堆相互矛盾的信息，而決策者內部對這些矛盾的信息的解讀存在嚴重分歧。因此，即使行為體有意克服認知上的局限，也還是難以避免錯誤知覺的形成，或者克服了這種類型的錯誤知覺，另一種類型的錯誤知覺又悄然而至。傑維斯這一學術成果的價值在於提醒我們，國際政治決策中需要更多的審慎，更多的謙遜。

應該指出的是，國際體系、結構和國家所處的位置，對國際間的互動、對微觀層面的國際政治變化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因此若想真正減少錯誤知覺的形成，還需在宏觀層面上有所建樹。例如，國際機制在增進相互了解、暢通信息、減少不確定性方面具有十分重要價值，國際機制的發展有助於減少錯誤知覺。又如在全球化時代推進社會多渠道聯繫，也有助於減少錯誤知覺，中日兩國民間存在的相互不信任和猜疑中，有相當一部分屬於錯誤知覺，就需要在宏觀的架構上，在機制和社會交往渠道上尋找更多的解決辦法。增強互信機制，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從新自由主義的角度看，國際制度和國際法治體系的建設、國際政治中無政府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建立全球公民社會，乃至建立世界聯邦，才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國際政治中的錯誤知覺問題。歷史上充滿猜忌與敵視的歐洲國家，由於建立了歐洲聯盟，相互了解、理解與信任得以推進，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在歐洲聯盟政治中的錯誤知覺減到了歷史的最低點，從而使歐洲聯盟的疆域成為和平的樂土。

在國際政治的宏觀結構還沒有得到改造的情況下，在現實政治面前，注意本書提出的問題對於外交決策很有必要。中國向來注重「知」，強調「知彼知己」的同時，往往忽略了在信息不完整、信息矛盾以及充滿不確定性，同時自身也存在認知局限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的錯誤知覺。事實上，中國外交史上也不乏由於自身的錯誤知覺而造成的深刻教訓，最近沈志華所指出的中國對於蘇聯提出的「長波電台」的錯誤認知即是一個典型事例。因此，對於中國來說，這個全新的領域更有深入探討的價值，以使我們能盡可能地減少錯誤知覺，提升外交的品質與效率。